科学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

□ 谢小军 任福君

回望历史，从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科学如此紧密地与社会、与公众相连，科学如此炫目地展示着它改造人类世界的威力——科学在公众生活模式的变化、在产业经济的更替、在社会文化的建构、在法律制度的变迁等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科技力量的不恰当使用使人类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人类的未来前所未有地充满着不确定。今天，科学的发展和与之相关的技术运用关乎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福祉和切身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不仅是科学家的科学，更是大众的科学。

公众参与科学是将科技发展对社会的作用纳入理性运行轨道的必要手段，也是科技的公共事业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需要民主，最直接地体现在科学的社会功能实现上，体现在公众的参与上。在历史上，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几乎完全出于个人兴趣，科研活动也只是科学家的个人活动，后来，科学家和科学研究逐渐呈现出职业化和建制化。不过，科技活动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局限于科学共同体的小天地里。

然而，今天的科技活动再也不仅是科学家或科技团体的行为，而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客观要求。科技活动已成为一项投资巨大的公共事业，这必然会得到全社会的响应。而与此同时，随着公民素质的提升和公共意识的深入，公民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参与公共事物的能力和欲望，他们以自己的知识理念、价值判断，通过各种途径监督着科技的发展与应用。

公众参与科学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科技政策的公众参与，很多科技政策又是公共政策，它必然涉及到公众利益。有人认为，在当代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有机会平等参与那些将要对他们的生活构成影响的重要决策。科技政策的公众参与为决策者提供了用更宽泛的视野、多学科的视角审视进入公共领域的科学问题的机会，它能够突破通常由政府和相关机构根据少数专家意见制定科技政策时不可避免的缺陷，尽可能地规避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

在一些国家，公众有不少科技政策制定的参与途径，最为有名的就是共识会议，参与者包括公民、专家和主办者（政府或民间组织），会议的议题往往是引起社会关注、有争议且需要政府政策回应的科技议题。共识会议的直接目标是通过充分公开的对话和讨论，在公民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共识会议的举办提供了一个听取来自公众的声音的机会，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它向政策制定者、专家和整个社会表达普通公民的想法和所关心的内容。

共识会议成果报告的建议和结论对正式的科技政策并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它对科技政策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一个开明的政府不可能不倾听来自公民群体的声音。除了共识会议，公众的科技政策参与还有听证、协商、评审甚至直接的公民投票等等。这些制度化渠道的安排，使公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可能，推动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广度和深度。

其实，在我国，公民参与科学的趋势也已经出现。在一些重大的公共科技事件中，已听到公民或公民团体的声音。如近年来所发生的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争议、转基因农作物争议，以及厦门、昆明、宁波等地的PX事件和什邡铜钼事件等。由于相关健全制度的缺失，一些事件中往往伴随着尖锐的官民对立。这充分说明，我国亟需建立科技政策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众参与渠道。唯有此，才能消解公众对某些政策的疑虑和不安，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曾说过，民主对于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但却不是一种最智慧的制度，因为每一个人参与政治的能力不同。因此，对于提高科技政策公众参与过程中的决策品质，还需要全体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只有这样。公民才能更有效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

图/CFP

不是唯一，胜似唯一

□ 杨 雪

随着各省高考分数线的相继出炉，又到了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时节。偶见一条微博，说浙江高考分数线出来后，西湖边就多了7辆救生船，并拉出横幅：“高考不是唯一出路”。后经调查，纯属恶搞，并且网上关于高考失利后欲轻生的调侃变着花样层出不穷。

每年高考季，段子必不可少，供大家消暑解闷。可一旦段子内容幻化成现实，还能有谁笑得出来？不久前，辽宁营口一复读考生，在高考答案揭晓当晚，背两块大石投河自杀了。高考失意者魂断河水泱泱，正所谓闻者伤心，听者流泪。今时今日，高考正以一种怎样的畸变形态存在？

条幅拉的好，高考不是唯一出路。再讲一个段子——北京考生：“老爸，我考了530”，“儿子真有出息，一本妥妥的，走，去上海旅游”。山东考生：“爸，我考了530”，“真没出息，二本都够不着，别上学了，滚去上海打工吧”。上海考生：“爸，我考了230”，“送你出国吧，学个工商管理回来帮我，今年又从山东招了不少农民工”。

当然，除了打工，还有蓝翔技校、新东方烹饪学校等等可以供这位山东考生选择，出路真的很多。只是，他们的人生，就从此走上不同轨迹。上了大学的孩子大多数按部就班完成学业，考研、出国、就业。虽然最终就业的时候都会被人像白菜一样挑来挑去，也不免抱怨一句“上这么多年学没用”，但基本上都能顺着几乎没有悬念的方向工作和生活。接手家族企业的孩子就更不用说，承蒙祖辈父辈荫泽，承担守业责任，好坏全由自己负责。

而那些未曾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当然也未必不能在社会上闯荡出骄人成绩，只是那凤毛麟角，概率就像中六合彩头奖一样。高考确实不是唯一出路，但却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所以，会有家长在耳边的喋喋不休，或严厉或哀求；所以，会有学生将自己的生命与高考捆绑，不成功便成仁。当下的社会结构，可以为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呈现多样选择，也可以为生在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学生亮起绿灯。但对于广大出身寒门希望改变命运的学子，高考不是选择，而是唯一。让人心寒的是，最初的最初，那位去上海打工的山东考生学习成绩是最好的。

别让“环评报告书”成为野人一样的传说

□ 陈 方

削平了5个山峰、填平数百个溶洞，“华中最高机场”神农架机场的建设再度引发了社会关注。然而，神农架机场的环评报告一直没有公开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神农架宣传部办公室人员表示，10月份之后将会给公众一个交代。投资高达10亿元的神农架机场计划今年10月1日正式通航，也就是说，机场建设对神农架的生态环境到底造成了多大影响，公众只有等到机场通航后才能知晓。

何为环评报告？想必当地官方心知肚明。环评报告书是一种预见性评定，在项目开工之前就应该公之于众。神农架机场从2009年2月18日正式奠基，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公众从没见过机场建设环评报告书的全本。

公众为何执着于神农架机场的环评报告书，这与当前社会处于“环境敏感期”不无关系。对于神农架机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重光曾表示，小面积的破坏，还可以填补、修复。但机场是大面积的，而且机场的周围以及机场相连的区域都可能会遭到一定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破坏。而且，自然的形成是长期的，是历史上几千年，几万年所形成的，我们是不可能修复的。在质疑面前，只有环评报告书才有说服力。遗憾的是，神农架机场的环评报告书却玩起了“躲猫猫”。

方便交通、促进旅游，这是建设神农架机场的美好初衷。但是，如果信息不能完全公开，好事也有可能变成坏事。神农架机场从奠基之初开始，关于它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果再没有环评报告来做“保证”，公众对该机场破坏性的猜想会愈加严重。不夸张的说，这又是一场公共舆论危机。如何应对，唯有信息公开。环评报告书到底有没有，如果没有环评报告书机场就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开工建设，必须有人出面担责；如果有环评报告书，那么神农架机场的建设到底对当地生态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应该采取哪些环境保护措施，这方面的信息必须彻底公开才能断了公众的“负面猜想”。

遗憾的是，神农架官方“等到通航后再给公众一个交代”的答复无疑是一种消极回应。当“生米煮成熟饭”后，“亡羊补牢”的成本是不是更高？回顾多起环境公共事件，多于官方信息不透明有关，这一次神农架更该吸取教训，积极向公众出具完整的“环评报告书”，千万不要让这份或许能说服公众的“证据”成了“野人”一样的传说。

治理网络谣言，功夫在网外

□ 卢阳旭

最近，人们对网络谣言治理问题，讨论很多，分歧也比较大。一方面，对于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机制，人们尚缺乏比较一致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重点应放在“网络”，还是放在“谣言”上，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网络技术影响谣言制造和传播的机制，为寻找因应之道提供依据。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空前便利的管道，但它无法决定信息内容，更无法决定人们“不约而同”地相信或不相信其中的某些信息。没有人相信的信息，即使通过网络，被人们接触到，也是水过鸭背，不留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远不只是一个由技术原因导致的信息接触问题，更是一个植根于社会情境中的信息识别与信息接受问题。

从逻辑上讲，信谣者的数量永远比造谣者多，造谣者众的前提，是存在一个数量更为庞大的信谣者群体；从需求—供给关系看，有需求支持的供给，才可能长得大，是信谣者养活了造谣者。另外，谣言产生现实破坏力的前提，是有人相信它，并进而做出相应的行动。再具破坏潜力的谣言，如果无人相信，不是胎死腹中，也是寸步难行。

研究表明，虽然谣言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但在社会快速变迁时期，谣言的数量会陡然上升，其影响也会迅速波及社会各个方面。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社会制度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个体、机构的行为的可预期性低。人们无法确定，哪些事情是可能的，哪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不确定感和安全焦虑会迅速上升、弥散，使人们对各种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特别敏感，更倾向于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这种社会氛围和大众情绪，会孕育规模庞大的信谣群体。

与此同时，谣言，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它常常涉及复杂的权力和利益纠葛。谁在造谣、谁有认定谣言的权力，谣言损害了谁、谁又从谣言中获利……常常会有些含混。在社会制度快速变迁时期，更是如此。换句话说，虽然人们常讲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其成立的前提，即清浊分明，常常较难满足。更糟糕的是，这个过程会自我强化，即清浊标准越不明晰，谣言越容易产生、传播，反过来，谣言又进一步使得清浊难分、真假难辨。在这个过程中，谣言这颗破坏性种子，被埋入了肥沃的社会土壤里，伺机破土而出。

打击造谣者，立竿见影、短期效果明显，是谣言治理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打击的强度、范围通常较难把握，容易产生“噤声效应”，并且很容易陷于“尽除之而后快”的误区，社会成本较高。事实上，有如我们不可能也无需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一样，消灭谣言，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一个切实的治理目标，是让社会对谣言具备足够的抵御能力。

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允许、帮助人们知道他们有权力知道的，为人们形成关于个体、机构的行为预期提供基础，降低人们在认知和心理上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在此基础上，确定能确定的，开诚布公地讨论尚不能确定的。以制度的确定性，降低、消除不确定性，从制度层面降低形成大规模信谣群体的风险，把谣言的生存空间和破坏力压缩到一个可控的范围。所有这些，均无关乎网络，却是治理网络谣言的治本之道。

取消城管是不是个好办法

□ 句艳华

这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暴力城管”的讨伐声势非常之大。愤怒是容易演变的，舆论甚至逐步形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口号：取消城管。

以延安城管为代表的野蛮执法孰不可忍。这样的城市秩序维护者，确实让人心寒，很难将其作为跟为城市和市民服务联系起来。不过，人们逐渐将愤怒蔓延到对城市管理本身，将思路集中在取消城管这样的举动，并不值得褒扬。一些城管人员无德不假，需要非常深刻严厉的批评。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城市管理。目前，舆论一边倒地讨伐城管，其背后的无照摊贩问题，无形之中就被掩盖掉了。

无照摊贩是与小广告、黑车等平分秋色的城市牛皮癣，抹黑城市形象，也给市民生活带来烦恼。在城管尚未“成名”的往年，晚报热线、市长热线等常可以看到对摊贩扰民的举报，甚至还有为此产生诉讼的。如今热谈美丽中国、和谐中国，而这些城市不文明现象，与美丽和谐显然是相违背的。

不少人有着朴素的正义感，咄咄逼人，振振有词：城管无非是近20年来的产物，和形成良好的城市秩序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国外城市无城管，怎么却能做到秩序井井有条？

听起来没问题，但其实比较想当然。现今中国的城市，几乎都遭遇了人口的数倍增长、流动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汽车数量激增等等问题，而且今天的商业发展规模，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既大又快。如北京，七环已开建，常住人口超两千万，如果没有相应的城市管理手段，这样一个巨型城市如何运转？恐怕情形远比现在糟糕。

国外是没有城管，但不意味着没有城市管理。从最近涌现的众多资料上可以了解到，国外对摊贩经营无一不有一套规范，对无照摊贩也有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还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做到对无照摊贩“大撒把”。而且，与所谓的国外相比，我们的国民素质情况如何呢？相信人们对此都心中有数。在一个公德意识、规则意识、法治意识不够的环境下谈无为之治，不仅不可行，结果也是可怕的。

有趣的是，最近还发现武汉有城管晚上变成地摊主的事，这个“变形记”足够讽刺。城管和摊贩之间，也只有一身制服的界限。更进一步说，灭摊贩的城管，和灭城管的正义者们，差异也不是很大。有句话说得尖锐，也一针见血：当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斥着无照地摊时，有一群人骂声最高，他们正是今天骂城管歇斯底里的那群人！

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弱势摊贩的生存是民生，但城市秩序同样是民生，面对二者的矛盾，对任何一方持简单的“打倒”都会越弄越糟。城管以拳脚驱逐摊贩，人们则以舆论暴力驱逐城管。打架中只要是受伤的，就是不由分说的弱者。

城市管理是一门大学问，既要有法律的冰冷，也要有人情的温度。城管部门成立的初衷起码是好的，认为它就没有任何贡献也不够客观。存在于城管身上严重的执法失范问题，是我们城市管理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不太高，在许多问题上还停留在围追堵截、临时抱佛脚、拆东墙补西墙的阶段，而不顾民意、长官意志独大的现象也很突出。此时需要做的，是对城管队伍加强管理和监督，提高其职业素养，另外也可从扶救制度上下手，缓解摊贩们的生存压力。当然，假如有其他部门代替了城管职能，或者是无照摊贩等问题有了较好的解决方式，那么取消城管也未尝不可。

城管的去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我们欢迎群策群力、发扬民意，但是一些射不到靶心的不靠谱意见，少一些倒还无足轻重，但多到绑架舆论，就不叫回事了。

被重新发现的熊彼特

□ 临 风

近年来，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在中国声名日隆，特别是一谈到“创新”，熊彼特的“五种创新”理念时常被人引用和提及，几乎到了“言创新必称熊彼特”的程度。不仅仅是中国，作为“创新理论”和“商业史研究”的奠基人，熊彼特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也正在被“重新发现”。据统计，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在西方世界的被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20世纪上半叶，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试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别样“答案”。熊彼特认为，“非均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这是他有别于同时代经济学家最重要的特征。在熊彼特眼中，作为经济活动的“创新”及其带来的“创造性毁灭”构成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而“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是实现“创新”和社会进步的载体。熊彼特的视界之中只有那些具有“征服愿望”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没有什么“科学家”。很难想象，如果他听到诸如“科学家要有工业概念；企业家要有科学头脑”这样的论调，会作何感想。

当我们阅读经济史和企业史，就会发现，在熊彼特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家”，现实表现却相当糟糕。即使在西方的所谓“进步年代”，那些“伟大名字”的光环背后无不充斥着尔虞我诈、不择手段和贪婪嗜血。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显然更具时代洞察力。

熊彼特一生扮演过多种社会角色，履职不到一年的财政部长，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等等。这其中最成功的当然是大学教授，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授课和演讲始终是广受欢迎的。一则轶闻反映了他的独特魅力。有人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托宾：对你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啊？托宾答：熊彼特。那人继续问：你从熊彼特那儿学到了什么？托宾回答：什么都没有，就是学了熊彼特当经济学家的样子。

熊彼特与同时代的凯恩斯，用“既生瑜，何生亮”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两人之间既惺惺相惜，也充斥不屑与论争。在20世纪中后期，凯恩斯显然是大获全胜，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讨论问题的框架和概念全部来自凯恩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成了那个时代响亮的口号。凯恩斯更关注的是“短期”经济均衡，为治疗西方世界的“大萧条”提供了一剂“急救针”，“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是凯恩斯的名言。而熊彼特更关注经济发展的长期演变，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纷乱时代，人们显然没有耐心听一个经济学家谈论什么“经济周期”。

熊彼特一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精确的经济学同精确的历史学一样难以实现。而“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学的“科学化”兴起，以数学模型表达的新古典经济学牢牢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阵地，而“文学式经济学表达”的熊彼特学派不得不节节败退。继承熊彼特衣钵的“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没翻起什么大浪，始终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边缘游走，发展程度甚至不如后起之秀的“行为经济学”。

进入21世纪以来，熊彼特在西方思想领域的地位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在有关经济长期增长动力的解释中，引入了研究开发、人力资本等新的生产要素，尽管分析框架还是主流经济学的，但在思想观念上不能不说受了熊彼特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当今这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言必称熊彼特”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熊彼特地下有知，听到他的“创新理论”在今天的中国大行其道，是否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当我们面对熊彼特思想体系时，撇走的往往是表面上那层“创新”的奶油，而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底层的“企业家精神”逻辑。相比于接受“市场经济”的艰难曲折，我们似乎不费什么力气就接纳了“创新”，而对熊彼特语境中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创新”也有多种方式的演绎，但对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却远远不够。

在时下的中国，真的存在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吗？应当认识到，熊彼特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与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还是存在冲突的。某种意义上讲，熊彼特的思想是被“借用”了，毕竟熊彼特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制度的捍卫者。

（《创新的先知：约瑟夫·熊彼特传》 托马斯·麦克劳著 中信出版社2010年）

“现场”与“情境”是中国创新的战略资源

□ 王迎春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重大冲击，如何开启国内市场成为各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的自身需求不仅可以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市场，更重要的是能为自主创新提供支持。如何挖掘并把本土市场转化为创新资源，关键在于用创新的思维把握和理解国内丰富的企业生产现场和消费者生活情境。

“现场”和“情境”融合了文化、管理、技术等各种要素，“需求”就是整合这些要素后的具体表现。中国还没有进入“标准化”生产、生活阶段。自身的体量和阶段性特征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丰富的生产现场和生活情境。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向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成为趋势，而优质的解决方案就是对现场和情境综合考虑与优化。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那些实现了优异发展的中小型企业都是深谙中国现场与情境的企业。一位企业家告诉笔者同事，他们相比外企的优势在于对用户现场的熟悉和个性化方案设计，他们可以把自身的商业模式公开，并不怕竞争，因为该企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客户现场经验，这种经验不可能短时间内被他人复制。“熟悉”是一种默示知识，虽然外企也在通过各种方式熟悉和占领中国市场，但中国企业具有先天的优势，只要坚持对熟悉的事物用创新思维进行加工，当这种现场经验积累到一定量以后，就会内化为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对其他对手形成先发优势和竞争优势。

面向中国本土的创新，表面看来具有经验的“局限性”，但本土市场可以培养出全球化的创新能力，面向本土的成熟创新产品也可以向其他地区市场扩散。从某种角度来说，外企在中国基本上是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而中国创新企业则从个性化中孕育标准化。事实上，异常丰富复杂的中国市场对于企业能力的要求更高，在这一市场中锤炼成熟的企业具有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缺乏的能力成分。一位华为的朋友告诉笔者，由于中国人在节假日有集中发祝福短信的习惯，华为的产品可以承载非常高的峰值流量，这使华为在阿拉伯某国的项目竞标中胜出，因为竞争对手公司的原有市场没有如此高的峰值流量要求，而伊斯兰教徒在宗教节日时也会出现高峰值需求。

“中国制造”拥有世界上最大、最丰富的制造生产现场，并且我国制造业正在进行转型升级，这会带来巨大的创新机会。德国大众在中国新建设的工厂是世界最先进的，因为其他地区较少新建工厂的机会，最先进的技术只有在新建工厂试用成本才最低。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不只是为了发展下一代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还因为生产制造的大规模外包使美国缺少了生产现场，而大量创新从现场产生，一个没有制造现场的国家，其核心竞争力是堪忧的，缺乏制造会威胁到美国的创新安全。

对于企业客户来说，生产的现场往往是创新的重要来源；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生活的情境往往成为创新的基础。中国丰富的市场结构类似于基因库，善加利用，就可能依托这些战略资源生发出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发展出大量优秀的创新型企业。